

黄万盛 著

革命不是原罪

革命不是原罪

黄万盛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不是原罪 / 黄万盛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5633-6701-6

I. 革… II. 黄… III. 人文科学—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50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6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册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自序：寻求意义 … 1

革命不是一种原罪 … 3

——序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 … 24

——序卡蓝默《破碎的民主》

心情与联想 … 36

——跨国公司与中国社会

价值重建和生活方式 … 54

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 … 96

儒家与自由主义 … 100

理性主义及其限制 … 103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 110

附：《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出版后记

启蒙的反思 … 117

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 … 122

大同理想:时代的使命和责任 … 131

——《建构世界共同体》编者手记

大学理念和人文学 … 155

哈佛的人文教育及其启示 … 178

启蒙的扬弃和儒学的复兴 … 202

——20 世纪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再认识

启蒙的反思 … 228

——与杜维明教授的对话

在启蒙的地平线上 … 314

——与衣俊卿教授的对话

全球城市的文化意义 … 342

——“上海论坛”发言纲要

自序：寻求意义



收集在本书的文章，绝大部分都与书有关，或者是为别人的书写的序，或者是为自己编的书而写下的文字。读书，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极为稀罕的仍然与意义有关的活动了。

要么是这个时代的过错，社会财富总量空前增长，可是，除了少数人暴富，芸芸众生仍然贫困、苦难。温饱难求，高谈意义，确实过分铺张了。当然，并不绝对，苦难之中，须臾不忘做人的至高意义，这是很高的境界。然而，要求所有的人非如此不可，置饥寒交迫于不顾，那便是道德的“暴政”。真正的危机在于，财富创造了“财富效应”，富有的人为了更多的占有而追求财富，穷困的人为了基本生存而渴望财富，财富成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人的追求目标。财富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公共尺度，成为判断成功与失败、体面与屈辱的基本标准。在这种效应下，当这个社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寻求意义！

要么是精英们的荒唐，精英所以是精英，乃是因为其对意义世界的揭示和持守，现在，“精英们”忘记了他们如何拥有精英的身份，不遗余力地解构这个社会的意义世界。“吃饭”的哲学、马桶的文化、“痞子”的文学、放弃“崇高”、颠覆“道德”，加上“政治精英”的贪婪腐化，这个社会出现了千古奇观，灵魂的塑造者出卖灵魂，意义的创造者嘲笑意义，怎么恶俗便怎么光彩！精神的圣殿倒塌了。在大学、研究院里，关于意义的探讨越来越不是学问，而被斥为大而无当的空疏议论。优秀的教师一本正经地把学生导向细枝末流的实证考据，不合格的老师则把搞乱学生的头脑作为职业成就。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在“语言学的转向”中迷失了方向，即便是西方语言学的大师们也难堪于语言分析对价值意义的无能为力；政治学津津乐道于“程序政治”，不屑于政治的道德理想；经济学热衷于经济模式，无意于探讨经济的伦理目的。在我们的大学里，

意义在哪里？人们古怪地回避着大学的神圣使命：寻求意义！

逃避意义意味着什么？意义是人的生命的存在依据。生命是什么？为什么活着？怎么活法？死是什么？如何面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痛苦、悲伤、无奈、愁绪？什么是欢乐、幸福、安宁、和平？什么是期望？什么是明天？什么是不朽？什么是永恒？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惑着人类的世世代代，困惑着人的今生今世！因为对这类问题的探究寻解，人才有精神、有信仰、有目标、有追求。人，因此而丰富多彩，因此而真、善、美，因此而不是酒囊饭袋、行尸走肉！逃避意义，事实上就是逃避人作为人的存在，就是把人类社会变成禽鸟虫兽般的动物园。消解意义就是消解人本身！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苏格拉底认为，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犹太的先知提倡，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海德格尔提出，人无论如何难逃一死，因此人得忧虑如何活着；如此等等。从古迄今，我们精神历史的家园里，总是不绝如缕地回响着先哲们寻找意义的声音，总有大师大德激励人们去寻找存在的价值。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庸俗而且狂妄了，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凡俗化、享乐化的腐化人生，正在成为这个时代趾高气扬的意识形态。或许，人们应当用心记住：没有意义的时代才是真正黑暗的时代！

这些年，我曾作过价值哲学的系列讲座，而且很多精力都放在“情理互为本体的脉络存有”这类基础哲学问题的研究建设方面，从哲学、政治、社会、伦理、经济、历史等不同方面重新检讨意义世界，是我的基本工作。收集在这里的一些文字，虽然不是讨论价值和意义的专门学术论著，但是都和意义领域有一定关系，可以当作了解当代意义问题的参考背景。

本书中收录了杜维明教授、衣俊卿教授和我的两篇对话，之所以全文保留他们的文字，是因为他们的谈话中有重要和深刻的见解，比我讲的要好得多。假如删去他们的内容，不仅会造成文本理解的困难，而且损失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希望所有的这些讨论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参与、指教，让我们凡俗的生活多少还有些意义。

是为序。

2007年5月于哈佛

革命不是一种原罪

——序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从巴黎来的长途，径直挂到了我在哈佛的办公室，“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要在中国出版，我们想请你为中文本作序，你是合适的人选”。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立即答应了，不仅是因为这通电话听起来颇为受用，更主要的是巴黎那些朋友们的知根知底：一份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报告是这些年来令我牵魂动心的学术计划，更何况弗朗索瓦·傅勒是当今世界研究法国大革命最负盛名的学者，为他的书作序，不只是荣幸，更是一份责任。

弗朗索瓦·傅勒，生于1927，卒于1997，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一生享誉无数。前不久，他被评为法兰西学院“不朽的四十位学者”之一。他担任过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托克维尔研究专家，等等。他的学术影响远远超越了法国，遍及世界，芝加哥大学聘他为“社会思想”教授，他还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是哈佛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名誉博士，等等。这些荣誉归功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成就，在这个领域，他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巨人，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耐丹·塔可夫认为“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负责地复活了法国的自由思想”。《思考法国大革命》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在最近二百年的人类历史中，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之广大久远，分歧之尖锐激烈，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相比的，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领域，它都在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激动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即使在美国这样以新教为基本精神的国家也不例外。毛姆说“法国人死

了,灵魂上天堂;美国人死了,灵魂到巴黎”。今天,当你坐在纽约曼哈顿岛前端的海堤上,眺望远处的自由女神,依然可以感受大西洋彼岸吹来的自由的风。在大学里,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专著、博士论文汗牛充栋,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中,试图绕开法国革命来讨论现代问题,是断无可能的,它成为必须面对的基本背景,不管你是否直接研究法国革命——连罗尔斯这样的学者也得处理法国革命展现的基本问题。甚至在儒家传统的中国,因为近百年来的变迁和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开始成为人们的时尚话题,一些思想的精灵振动着想象的翅膀,从中国飞舞到法国,企图用那副很写意的羽翼把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串连起来,创作一本关于革命的连环画。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段中,法国大革命都仍然是关于现代性、现代政治最重要的话题,它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空间会伴随历史的进程不断地展示出新的意味,产生新的课题。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格外重要: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同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如何建设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何理解现代性的真正含义?如何创建可以保证现代性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在所有这些方面,法国大革命呈现的经验教训都是不可逾越的重要参照,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中文版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十几年来,英美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政治学界占了压倒性的影响,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来源于英语世界,无论是苏格兰启蒙学派,还是美国功利主义政治实践;无论是社群主义,还是文化主义政治学;这些学术流派构成了中国当代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前提,法国的学术思想除了所谓后现代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在文学评论领域中引介以外,则很少见于政治学的讨论。这种主观性的偏爱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是不健康的。傅勒的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法语世界的学术线索,丰富我们的学术谱系,在思考现代性时增加一个必要的参考向度。我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受到傅勒的观点的很多影响,尤其是以法国革命的典范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他给我的启发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分享心得,或许是推介这本书的比较好的途径。

中国现代性寻找的过程是个非常感人的当代故事,它的每一个片断都无比生动,令人震惊。她是那样执著地寻找现代性,近乎疯狂地渴望现代化,像一个多情的恋人,几乎和西方的每一种现代化都有一段真诚的苦恋,然而,这

个不幸的情人却一再地失恋，一再地被拒绝，现代化始终是一个不能相拥的梦中王子，即使是那个长着一脸胡子的马克思和他的巴黎公社的伙伴们，留给中国的也是五味杂陈的复杂体会。可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在每一次挫折后都能重整旗鼓、继续寻求。汉学家费正清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令人感动的真正的人的故事。当我前往巴黎时，伴随我的就是这份惆怅，以及与这惆怅相关的困惑，那个法国革命所开创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步伐如此蹒跚坎坷？中国在理解法国经验的时候是不是存在原则上的失误？

1992年，我到巴黎。此时年距1789年法国革命的“攻占巴士底”和其后的“联盟节”二百有三，而为今人非议最烈的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在二百年前尚未揭幕，这两个年份是法国大革命史中最重要时标。换言之，世界性的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正当其时，巴黎理所当然地是纪念、回顾、反思的中心，而那遥远的东方则给这个二百年的庆典平添了一个意味复杂的注脚。现代政治两个最重要的价值“自由”和“平等”被还原到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背景中重新思考，为它背书的却不仅仅只是法国革命的是非曲直，更主要的还是其后二百年来现代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纷纷扬扬的利弊得失。在一种后设史学的立场上，经由自由和平等的不同向度，彼此歧义水火不容的政治实践居然都把自己身世起源的认同落实在法国大革命的辉煌记忆中。而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又成了这样一个怪物：它看起来是个整体，可是它的不同部分却能相互搏击，执著于自由或执著于平等的不同立场，可以撕下他所厌恶憎恨的法国大革命中不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攻讦诋毁；而对他能皈依膺服的那一部分奉若神明，称颂不已。

在历史的长河中，二百年是个不算长的时间，可是对于风化法国大革命却已经足够了，法国大革命被思想的风沙摧化成一块块碎片，飘舞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空间里，形成了我们时代的光怪陆离的法国大革命史学。而且这些法国革命的碎片还被赋予了思想的魔力，人们挥舞耍弄着，振振有词地诠释着那些与法国革命并不直接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今天的事件。这是一个后设史学的恶性循环，从后来的事件出发，寻找一个法国革命的理由；再把这个理由建构成一套诠释性话语，用以剪裁今天的故事，端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有法国依据的理论叙事，津津乐道地享受一道精神的法国大餐——尽管那精神大餐的思想原料实在是与法国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做法，不仅把法国革命的研究搞得面

目全非,同时,也使一些现代事件的解释穿凿附会、扭曲牵强,疏漏了种种现实的原因,如同《红楼梦》所言:你不说,我还清楚,你一说,反倒糊涂了。我并不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后设史学,研究历史,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人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智慧、更有远见,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任由主观意志扭曲历史,编造满足自己需要的所谓历史经验。这是不健康的,可却是一些“江湖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这些原因,历史事件越是久远,对它的研究,看起来也就越像是对以往的人为偏见的纠正厘清。何况是法国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每一个阶段中充满了各种观点、派别的尖锐对立,在不同的阶段又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内部的纷繁事变和目标频换,提供了在某个片断上漫画法国大革命的可能,但是,仅仅从这种可能发展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理论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这就是傅勒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如何从各种相互径庭的法国革命史学研究中,重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观念,这绝不是一个史料学的工作——无论你发现多少新的史料,对于傅勒的工作或许会小有补益,但不会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他要做的是把法国革命理解为一个整体性的事件,在这个整体的内部对各种变化作出既合乎事实又合乎逻辑的解释。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那种语言学意义上的逻辑,而是事件由于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需求、社会理想而导致的某个演变方向,因此,这基本上是一个有历史意味的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工作,但是,它是严格地在历史学的意义上开展的。

傅勒的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其困难并不在于它的文字,严谨的学术著作文字往往拗口,令人费解,相反,这本书的文字因为中文译者的努力,相当平朴流畅、清晰易懂;其困难主要在于他所运用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不是用直陈的方式阐明他对法国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而是相当精细地对那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法国革命的成果进行辨析,他的观点隐藏在那些左右辩难反复推敲的拆解和分析中。事实上,这还不仅仅只是一套方法,它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学术立场,尤其是在当代法国学术界中,这已经是相当普遍的趋向。在史学中,历史研究不再是一个既定意志的展开,因此也不是用理性观念建构历史,而是把历史还原为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过程。由理性主义宰制的历史研究观念已经被驱逐了,企图用一两个象征事件来代替复杂性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

术典范的转移早已开始,只是我们对它不够敏感而已。今年早春,我在广州曾经作过一个学术讲演,讨论哲学典范的转变,引起比较热烈的探讨。傅勒这本书的学术方法正是我所推荐的脉络主义的具体演示。我们切切不可对“解构观念的暴力”掉以轻心,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所谓后现代主义中的一支流派,从海德格尔提倡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倾听“存在”的声音,到福柯的谱系学理论,理性主义的晚钟就已经敲响,就学术领域而言,理性主义主导的“技术化”时代正在过去。

以观念的“技术化”的立场看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只是一种纪念性的自我叙事,法国大革命只是为了证明某些特殊自我存在和意义的一个“说词”,尤其是把法国大革命和一个物质化的现代化追求联系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些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观点,例如:夸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与法国革命的政治理想的区别,把英美民主当作现代典范,忽视法国革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突出法国革命中的“革命”,因此,把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连成一条历史线索,检讨当代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因为突出“革命”,所以“雅各宾专政”成了法国革命最重要的象征事件,而雅各宾时代血雨腥风的“公安专政”被当作“暴民专政”,因此,法国革命的反思成了警告“暴民专政”的必修课;因为卢梭倡导自由平等被路易十六驱逐国外,在法国启蒙时代有很大影响,而罗伯斯庇尔的所作所为需要一个精神思想的源泉,因此卢梭就必须为罗伯斯庇尔负责,卢梭也必须为法国革命种种负面的暴行负责,卢梭必须承担发动一切现代革命和现代暴行的原罪——在中国有人从卢梭推理毛泽东,在国外有人宣称卢梭同样必须对希特勒和纳粹背书;更进一步,卢梭主张道德理想的政治,既然如此,那道德理想也难辞其咎,一切从道德理想出发的政治都可能危害民主,成为暴政,因此,民主被理所当然地看成了一个完全不带情感的程序;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不只是出现在当代中国,其实,在国外学界早已是屡见不鲜,只是中国的当代困境和“文革”反思的特殊背景,把这些观点病态地夸张膨胀,扭曲成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看法,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影响。我希望傅勒的这本书能够帮助人们纯清这些片面的不实之词,给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提供一个健康的学术方向。傅勒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必须打破这种纪念性史学的恶性循环。在我这代人当中,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下,这种东西曾经长期时髦,总是强调历史植根于它自己的时代、它的选择或它的规定

性。拿这些招眼的玩意儿一炒再炒,虽然有益于抵制‘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幻想,却极有可能没完没了地助长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在我看来,大革命史学中充塞的精神惰性和令人敬畏的嚼舌头更甚于政治意识形态。我想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必须去掉它给后人留下的常识意义,还它以同样是历史学家应具备的一样首要东西,即知识上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历史知识活动。再说,两个世纪以来使我们社会的论争持续不断的政治信仰总有一天也会让人大有意外之感,就像我们今天回头去看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的宗教冲突那样,既感慨于无穷无尽的变化,也感慨于无穷无尽的暴力。现代政治场域本身,如法国大革命所构成的那样,或许将来也会显得像是另一个时代的解释系统和心理投资的吧。”在傅勒这个思路下,我想就上面提到的那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议性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作为一个“解释系统和心理投资”的法国革命研究的尝试。

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人,一般都会突出英美的政治经验,强调英美的自由主义的选民政治,来批评法国革命对“自由”的“伤害”,把英美和法国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典范,进而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当然,在他们的视野中,英美的现代性是比法国的现代性更好更合理的现代性选择。这是不值得见怪的,尤其是今天,普遍的功利主义趣味主宰了现代性的基本标准,膜拜英美的政治经验,据为经典,广为推崇,事实上是个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是个肤浅的看法,因为夸大了二者的对立,使得民主政治和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但却是深刻的精髓被轻率地遗忘了。在一个现代政治的“解释系统”和现代化的“心理投资”角度,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同一性要远大于它们的区别。17世纪的欧洲各国,事实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改朝换代,政治上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各国王室几乎都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改革,这种状况甚至使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其实是路易十六改革的继续和必然结果。看起来,革命并不是必须的,可是,为什么它却出现了,而且席卷了整个欧洲?这是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有一个新的因素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来的权力秩序逐渐失去了它的古老的基础。这个因素就是“社会”。在法国革命以前,国家从来都是君主的国家、国王的国家,路易十四可以大言不惭而无人质疑地宣称“朕即国家”。曾几何时,蛰服在王权华盖之下的社会,开始苏醒,并且迅速地成长

起来,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横向组织越来越多,国王的国家已经无法全面地包容整个社会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成了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危机。国家到了必须重新定义的时代,社会需要自己的权力,权力的危机使得整个欧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欧洲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权力的问题,自由和平等是在权力的意义下提出的。这是共同的问题,因此,欧洲的启蒙并没有民族主义色彩,寻找自由和平等的新型权力的人们亲如一家,国家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共同对付的敌人。美国也一样,美国早期的民主思想家们,此时此刻,都在欧洲接受启蒙的熏陶、革命前夜的洗礼。当华盛顿总统要制定美国宪法时,他是从巴黎请回了杰弗逊和他的同伴,他们带回了法国关于自由、人权、平等的理念;同样,他们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久又传回法国,成为法国“人权宣言”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英国虽然在后来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反法国大革命的学者、政治家,但是,不要忘了,差不多早在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前,那个砍掉了英王查理一世脑袋的摄政王克伦威尔就已经打出了“主权在民”的旗号,这对法国的思想家们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如果想要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仅仅拿法国大革命为自己的观点作个注脚,首先应当了解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所面对的真正课题,同时也是当时欧洲所面对的共同课题,只有了解了这个共同性,具体的区别才能显示实际的意义。

我不否认英法之间是有区别,就法国大革命而言,真正的区别在于,为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对问题交出的答卷在历史的舞台上具有普适的意义,而不是英国更早时的革命?傅勒有颇为精彩的解答:“由于坚守基督教的欧洲,政治行动理论如马基雅弗利……或关于社会制度历史起源的学究式讨论,从17世纪就大行其道了。英国革命的例子显示,在集体动员和集体行动方面,精神的基本参照始终还是宗教的。法国人在18世纪末开创的并不是作为世俗化领域且有别于批判性反思的政治,而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主政治。”“1789年的秘密,它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辉煌,就在于这个尚无先例的发明。它必将得到广泛的传承。在相距一个世纪之后,在使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接近的所有特征中,之所以没有一个特征足以确保前者拥有后者出现在历史舞台后扮演的那种普适范例的作用,那是因为克伦威尔的共和制依然被宗教性包裹着,并且由于回归源头而僵化了,缺少使罗伯斯庇尔的语言变成新时代的预言

的那种东西：民主政治成为人类和各民族命运的仲裁官！”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的阵痛，分娩出一个巨大的产儿，它的降临使我们可以自豪地以“现代社会”来命名从此往后的社会，这个新生儿的名字叫做“现代民主政治”。因为它的出现，政治权力脱胎换骨，从王室的深墙后院走到了人民中间，人民成为政治权力唯一的源泉，这是民主政治的实质，也是法国革命最重大的贡献，并且，请记住，这是法国革命的贡献，而不是英国的贡献。英国不仅在克伦威尔时代没有理解权力的真正源泉是人民，克伦威尔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仅仅因为教派的不同，拒绝天主教徒参加对王权的讨伐；就是在“光荣革命”中，在社会权力的理解上，也仍然保留着王室对权力的象征性垄断。当然英国对现代民主也有贡献，关于选民政治，关于程序政治，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方面，但是，这仍然不同于法国革命的意义，法国革命使民主政治成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信仰，人民才是权力最基本也最合法的拥有者，这是古代政治向现代转变最重要的分水岭，没有这个根本的权力属性的规定，程序政治也会成为迫害人民的工具，成为民主的敌人。

那些以英美政治经验来批评法国革命的人，其一个强有力的批判角度就是以英美选民政治体现的程序政治原则来质疑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观念。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程序政治和人民主权真有那么尖锐的对立，它们作为权力属性和权力运作方式本来是一个统一结构。但是人为地把这两个方面看作两个不同的典范以建构现代民主，这就有了必须重视它的充分理由。还是回到人们习惯引经据典的英国经验，我绝对相信，隐藏在“民主政治”背后那个王室的暗淡的影子，在它自身的意义上已无任何可能威胁民主政治的存在；但是，这个阴影的存在却有另一种象征意味，说明了民主权力仍然存在着不完全坐落在“人民主权”上的可能。程序应当是“人民主权”的表现方式，但也可能脱离权力规定的约束，展现程序的自我意志，异化成人民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威，我把它称为“民主的异化”。时下学术界一部分人对程序政治的推崇迷恋，把程序当作民主政治唯一不可质疑的原则，这种程序的拜物教倾向，正说明了程序越出权力约束的危险。有一点是不错的，这种突出程序优先的倾向的确是更多地体现在英美的政治实践中。美国政治学家熊彼特就认为，民主的根本就是选举政治，就是多数机制。但是，我们知道，民主经由法国大革命获得了一整套基本价值，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些价值之上的，程

序是关于政治的“技术”，而技术是由人来运用的，民主政治的程序运用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民主价值的实现。但是，现在我们的确看到在法制的名义下“犯法”，在程序的庇护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只要合乎程序，无论多么暴富，无论多么赤贫，都可以心安理得，程序事实上保护了贫富差别的日益扩大。以哈佛为例，它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大本营，哈佛员工的平均工资在年薪三万五千美元左右，但是，哈佛资产管理人的年薪却是三千六百万，整整差一千倍，而且，麻烦在于，如果你不雇他，有的是地方抢着要，这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基本状况。民主社会的程序从来不质疑这种状况的合理性，相反，那些拥享高薪的人们可以毫无愧意振振有词地认为他是严格遵守这个社会的一切程序——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民主政治？假如，我们把程序严格地限定在民主的基本价值之下，那么，当程序不能充分反映价值，甚至抵牾、破坏价值实现，那就必须改造这个程序，使它符合民主的要求。哈佛所在的剑桥市就在尝试改造一人一票的选举的程序政治，按照一人一票，弱势群体基本不可能出现在任何政府机构，现在，剑桥的选举实行一人五票，可以把五票集中给一个人，也可以分散给不同的候选人，这就改变了原来意义的多数机制，使得弱势群体有可能进入政府权力。这种改造的动力就来源于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信仰。如果你是个工具理性主义者，那当然会把所谓程序看作唯一至上的原则，遗憾的是，从韦伯晚年对“铁笼”的恐惧到今天，工具理性造成的迷失，已经是当代反思的基本点。民主价值如何充分实现，仅仅靠程序是远远不够的，以所谓英美的程序优先来苛评法国大革命，可能消解的正是法国大革命发现的民主的基本价值，这是相当危险的。

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看待“革命”，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一方面的原因是后设史学把革命涂染得五彩斑斓，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把革命看作是改朝换代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保守主义们把革命看作杀人越货涂炭性命的暴政；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法国革命内在的复杂性造成的，1789年的革命和1793年的革命看起来是那么不同，使得人们可能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上，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各执一词，只有像傅勒这样的史学家才会既要考虑二者的区别，更要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形成对“革命”的一个严格历史学的看法。

这里面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是：从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化的基本途

径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和但并不彻底的模式就是“代议制”政府的构成方式，但是法国为什么没有走这条道路？“代议制”的成功需要一个阶层，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二者必须是一体的。能把两方面合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实体，叫做“贵族自由主义”：因为是贵族，他有不同于大众的身份，可以相对合法地挑战君主的权力；因为是贵族，他有“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主义倾向，在这个旗号下，吸引中产阶级站到他的身后，成为他的社会基础。曾经有一种说法，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力量就是中产阶级，只要发展出中产阶级，现代民主政治便水到渠成，这个想法乐观得有点幼稚了，至少，在英国，他们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中产阶级是典型的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群体，他们渴望暴利，而拒绝任何风险，他们宁可通过行贿来交换一些局部的利益，而绝不会冒险成为改革的中坚，因此，过渡时期的中产阶级往往是腐化和猥琐的一帮。中国当代的情况似乎是在证明着这一点。相反，革命时期的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意义理解甚至远远超过贫困阶层，例如法国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中的那些中产阶级。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是，可以导引“代议制”的贵族自由主义并不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18 世纪的法国就几乎没有这个力量。法国人不是嗜血如命的民族，他们没有理由不接受一个温和的而又可以促成法国改变的改良政治，大革命前，从“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言”，一直到后来成为法国国庆节的 1789 年的“联盟节”，法国人希望的就是和国王联手推动法国的改革，但是，国王一再地反悔他与大众的契约，终于使得任何“代议制”形式的变革都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早已洞悉了公民社会、社会契约这些现代民主政治奥秘的法国政治思想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引领法国革命开辟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傅勒对这个革命形成的过程有深厚的理解，他说，“18 世纪的法国社会在苦苦地寻找代理人。诚如今天有人说的那样，它的确是太‘发展’了，无法像在上个世纪那样再保持寂静并服从于国家。但是在寻找一种政治代表制度的过程中，它与路易十四的遗产发生了抵触，这种遗产不仅维护乃至加固等级社会结构，还系统地关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传统沟通管道。等到路易十四驾崩的时候，法国社会自然而然就走向传统渠道的复活了，尤其是重振大法院的职能。可是，这些大法院一百年来不断地显示出它们的保守主义，如谴责《百科全书》、禁止《爱弥尔》、声讨可怜的卡拉斯，因此它们已经不能成为被启蒙‘照亮’的社会的最佳代理人了”。在这个分析中可